学术专论

危险的馈赠：咸同年间俄国送华枪炮与教习始末（1856—1862）

丁国宗

[摘要] 1856年2月，俄国为配合远东扩张，决定赠送清廷枪炮以助其镇压国内起义。1858年5月，俄国驻华大使普提雅廷首次向清廷正式提议馈赠枪炮与教习用以对抗英法联军，但被咸丰帝拒绝。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结束后，普提雅廷再次提议并经咸丰帝同意，但武器中途却由新任大使伊格那提耶夫移交远东总督穆拉维约夫。1860年底，俄国在签订《北京条约》并获得利益保障后第三次提议，清廷再度接受，枪炮分两次送交清廷，并且俄人在恰克图训练清兵。但俄国未能借此安抚清廷，反而因其扩张与附加条件引起后者戒心，清廷最终将英法作为学习与依靠的对象。

[关键词] 俄国枪炮　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帝　普提雅廷　中外格局

[中图分类号] K2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1－0161－012

19世纪50年代中期，俄国在争霸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惨遭重创，转而将扩张矛头指向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为了配合其远东扩张及与英法争霸的目的，俄国表示要赠送清廷一批枪炮并派遣教习用以训练清军。中外学界对于俄国馈赠一事有所关注，[①] 但是有关此事的酝酿与提出、清廷不同时期的回应、馈赠用途的转变、馈赠中止的原因、武器的数量型号以及最终分配使用情况等方面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此事又与中外关系、远东局势、清廷师夷长技等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因此，笔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综合中英俄各方史料以梳理此事的来龙去脉，掌握馈赠的具体内容并订正部分错误说法，以求能在晚清师夷长技、俄

[收稿日期] 2023-02-23

[作者简介] 丁国宗（1995—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101, dingguozong@163.com

[基金项目] 本文由“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41991）资助。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崇文印书馆，1947年，第114页、134-136页；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年 <北京条约>》，王瓘、李嘉谷、陶文钊合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6页；A. 波波夫:《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6号，中华书局，1978年，第38-40页；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6-157页；陈开科:《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422-424页；奥列格·阿拉别托夫:《溃败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战争》，周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7-58页；Mark Mancall, “Major-General Ignatiev’s Mission to Peking, 1859—1860,” *Papers on China*, Vol. 10(1956), pp. 60-61; R. K. I. Queste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p. 67, p. 115, p. 275; Сосна. Н.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миссии Н.П. Игнатьева в Китай в 1859—1860,”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 1(2020), С. 33.

国对华政策及列强博弈等史学问题上厘清史实，补益研究。

一、俄国的第一次提议与清廷拒绝

自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进占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便为俄国的钦定国策，[①] 鸦片战争的结局则让俄国窥见到了“中央帝国”的虚弱，[②] 而俄国西伯利亚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也推动俄国向太平洋扩张。[③] 自 19 世纪 50 年代始，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内需镇压各地起义，外要应对英法列强的修约与战争，这给予了俄国对华扩张的绝佳时机。[④]1853 年，英美在华官员中间盛传俄国欲出兵助清，镇压太平军并将中国变成它的被保护国，[⑤] 同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Н. Н. Муравьёв）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不能拥有整个东亚，那么也要占据整个亚洲东洋的海岸。”[⑥] 在 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手击败俄国，终结了后者在拿破仑战争中取得的欧陆支配地位，[⑦] 迫使俄国的扩张矛头转向中亚与远东，并在 1855 年底已进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⑧]

俄英适时在亚洲展开“大博弈”（The Great Game），俄国将未来命运定在亚洲并视英国为最强对手。[⑨] 俄国希望夺取英国在东方事务上的领导权，还担忧后者抢先征服中国。[⑩] 有鉴于此，俄国需要安抚清廷，防止后者倒向作为其对华扩张最大障碍的英国。[⑪] 而中英正因修约而剑拔弩张，若能增强清军以对抗英国则更为上策。俄国向清廷提供新式枪炮与教习一事，正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此举目的有三：其一，可以作为攫取中国领土后的一种安抚手段；其二，在英法联军发动对华战争时，能帮助清廷对抗英法联军，从而削弱英法；其三，俄国可以借此提高对清廷军队的影响力与控制力，进而掌控清廷国防。[⑫] 其中，最核心的是第一点，即俄国需以条约的形式，正式将其在黑龙江流域进占的领土合法化。

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蚕食引起了清廷的警觉。1856 年 1 月 3 日，咸丰帝授意库伦、吉林、黑龙江三地疆臣联合通知俄国萨纳特衙门，拒绝更改边界。[⑬]2 月，俄国接到联合咨文后有所动摇，但在穆拉维约夫的坚持下，沙皇批准俄军继续在黑龙江上航行，授予前者全权与中国谈判并签订条约，还表示“倘若中国按照我方要求做出若干让步，则可按事先商定的数目向中国提供大炮”。[⑭] 这是俄国首次提及馈赠清廷武器，目的是换取其在黑龙江的航行权。清廷时遭各地起义的沉重打击，大炮可以助其镇压内乱。

---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 79 页。

② Mark Bassin,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2.

③ П. И.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姜延祚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67−106 页。

④ Sarah Crosby Mallory Paine, *A History of the Sino-Soviet Border, 1858—1924*,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pp. 62−66.

⑤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 215.

⑥ Nikolay N. Bolkhovitinov, “The Crimean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Proposals for the Sale of Russian America, 1853—186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9, No.1(February 1990), p. 18.

⑦ Barbara Jelavich,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Tsarist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814—1974,*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33.

⑧ T. C. Lin, “ The Amur Frontier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1850—186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 No.1(March 1934), pp. 7−13.

⑨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0, p. 453.

⑩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 2 卷，黑龙江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54 页。

⑪ Mark Bassin, Imperial Visions: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pp. 103.

⑫ Mark Mancall, “Major-General Ignatiev’s Mission to Peking, 1859—1860,” *Papers on China*, Vol. 10(1956), p. 81.

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第 3 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年，第 175−177 页。

⑭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 1 卷，第 460 页。

咸丰朝的清廷不再能同康熙朝那样调遣大军对俄人进行武力驱逐，英国学者奎斯特德（R. K. I. Quested）将咸丰帝的对俄政策概括为：只要俄国不进攻，也不进占黑龙江以南的人烟稠密地区，他就仅采取纸面抗议而不采取实际行动。① 截至1856年底，俄国已将黑龙江左岸地带据为己有并设为东西伯利亚滨海省，② 签订条约业已成为最后环节；同年10月，英军炮轰广州，这让穆拉维约夫担忧英国可能在东亚进攻俄国侧翼，加快了俄国解决黑龙江问题的步伐。③

1857年2月，普提雅廷（Е. В. Путятин）被任命为俄国在华全权大使，其主要任务为占领黑龙江左岸领土并获取整条河流自由航行权，在北京建立正式使团，以及取得中国沿海五个条约口岸通商权利等。④ 其中，"最重要、最首要的问题，应当是确定俄国对阿穆尔河的权利的问题"，⑤ 提供枪炮弹药成为俄国安抚清廷的手段，而解决中俄领土问题的权限从穆拉维约夫移交于普提雅廷。1857年2月9日，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Е. П. Ковалевский）致信身在北京的大司祭巴拉第（П. И. Кафаров），令其告知清廷："俄国永远准备帮助，无论是在道义上，或于一定程度的物质上，诸如供应军械弹药以供国内使用。"⑥ 普提雅廷在19日得到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А. М. Горчаков）的训令强调若能在黑龙江问题上得到有利结果，就必须履行给中国许下的诺言，"组织、武装和指导训练一些中国军队"。⑦ 这批枪炮与教习成为普提雅廷用以完成任务的筹码。

然而，普提雅廷很快陷入了困境。他先是反复投文，请求清廷应允其自恰克图陆路进京，遭到拒绝后决定取海路至津。⑧1857年8月7日，普提雅廷乘坐"亚美利加号"抵达天津并要求进京，结果又被清廷拒绝。⑨ 时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普提雅廷转而坐船南下并在11月与英、法、美三国全权公使聚于香港。14日，他主动联络英国额尔金伯爵，讲述自己在白河口的遭遇，放言只有炮舰进逼北京方能迫使清廷让步，深以为然的额尔金邀其加入北上行列。⑩12月29日，普提雅廷自香港致信圣彼得堡，建议炮轰白河以强迫清廷割让土地，但此时身在圣彼得堡的穆拉维约夫说服沙皇改授其全权处理中俄领土问题，普提雅廷主要负责商务问题并扮演中国与英法之间的调停者。⑪

1858年4月，英法舰队北至白河，战争乌云密布京津。⑫ 普提雅廷则乘船跟随，沿路与各国代表交换意见、提供情报。⑬ 此时，普提雅廷得知被任命为解决中欧问题的专员，领土问题改由穆拉维约夫专办，但他认为穆拉维约夫不能解决此事，仍坚持自己负责领土问题。⑭ 普提雅廷在与清廷人员交涉过程中一方面借助英法联军的压力恐吓清廷君臣，表示一旦清军开火，联军将一举摧毁所有炮台；⑮ 另一方面则充当清廷的"帮助者"，声称只要清廷同意俄国请求，后者便会

---

① R. K. I. Queste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p. 57.

②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494页。

③ Perry McDonough Collins, *Siberian Journey: Down the Amur to the Pacific, 1856—1857*,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2, p. 18.

④ R. K. I. Queste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p. 66.

⑤ A. 波波夫：《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6号，第30页。

⑥ R. K. I. Queste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p. 67.

⑦ A. 波波夫：《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6号，第31页。

⑧《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5，第518–536页。

⑨《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6，第554–557页。

⑩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Harrison and Sons, 1859, pp. 53–54.

⑪ T. C. Lin, " The Amur Frontier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1850—186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 No.1(March 1934), pp. 17–18.

⑫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pp.261–263.

⑬ 卫三畏：《北上天津北京远征随行记（1858—1859）》，宫泽真一等转写、整理，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1858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9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第21–22页。

⑮ 卫三畏：《北上天津北京远征随行记（1858—1859）》，第23页。

出兵助清，[1] 但俄军无力入华对抗英法联军。[2] 为进一步利诱清廷，普提雅廷开出了枪炮与教习的砝码。4 月 24 日，他要巴拉第向清廷转达："俄罗斯派军官到中国修筑海河入海口的防御工事；给中国 2 万支马枪（后来减少到 1.5 万）、几种（不到 20）要塞炮和野战炮以及传授制造优质火药技术的工人……预定明年春天送来这些军官和枪炮。" [3] 5 月 1 日，普提雅廷向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正式宣布：第一，中俄重新划界；第二，俄国应获得与英法美等同样的通商特权；第三，若清廷应允前两条，俄国愿意赠送枪炮并且派遣教习以操练清军，"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4] 此时枪炮的用途从助清镇压内乱改为对抗英法。[5] 7 日后，谭廷襄奏报俄国正在勘界，并称"欲另遣一人由陆路过恰克图，为中国预备枪炮官兵，以为教演制造之用"。[6]

这是俄国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馈赠枪炮与教习，但为咸丰帝断然拒绝，后者在 5 月 8 日的上谕中指示"当旱路走恰克图预备枪炮一层，当妥为阻止"，原因有二：一则担忧惊扰蒙古，别生枝节；二则"中国从不与各国海上争锋，军器亦尚可恃"。[7] 更深层的原因是清廷君臣知晓俄国占地通商的野心：俄国与英法在侵略中国方面"联络为一，固结不解"，所谓"帮助说合，断不可靠"。[8] 因此，咸丰帝在综合评估了国家安全、中外局势与自身军事力量后，谢绝了俄人的请求。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谭廷襄等人屡奏军民同仇敌忾、武器可恃，但是巴拉第在自京至津的一路观察后认为：当地军民并无信心对抗欧洲军队。[9]

得知清廷拒绝后，普提雅廷态度大变，不但拒绝帮助清廷调停，而且逼迫后者划界让步，声称："代筹枪炮制敌，系属为好，转不给脸。他国之事，从此不能再管，即日遣人前往黑龙江办理。"谭廷襄一针见血地指出："揣度其意，总欲占我江左之地，因英法需为说合，挟制要求，反复无常，情殊可恶！"[10] 至此，清廷君臣对俄国调停失去信心，不肯在领土问题上向俄国妥协；在英法问题上，清廷又在公使驻京、内河航行等关键问题上拒不让步，英法联军决心开战。[11]

二、俄国的第二次提议与清廷同意

1858 年 5 月 20 日，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爆发，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仅两小时，鸦片战争时期修建的大沽炮台便告失守。[12]24 日，亲睹战事的谭廷襄指出了双方武器上的巨大差距："夷炮所至，两岸一二里内，不能驻足。抬枪抬炮，不能伤及其船。其不能战者一……我之大炮，不及其劲捷，炮船两面齐放，不能躲避。其不能战者二。"[13] 这就点明了中西武器在射程、威力、射速、机动性等方面的差距。此时大沽炮台最得力的火炮仍为康熙朝南怀仁等西人所监制，余更粗制滥造，总不出前明红夷大炮的规格。[14] 相较之下，英法联军的装备却是蒸汽舰船、后装线膛炮与新式线膛

---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第 3 册，第 351 页。

②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99 号，第 26 页。

③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99 号，第 24 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1，第 731–732 页。

⑤ 波波夫否认俄国赠送清廷枪炮有对抗英法联军的目的，显然不合史实。A. 波波夫：《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36 号，第 38 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1，第 751 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28 页。

⑧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1，第 735 页。

⑨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1，第 741–742 页、771 页；卷 22，第 785–786 页；《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99 号，第 28 页。

⑩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1，第 771 页。

⑪ 查理·德·穆特雷西：《远征中国日记》，魏清巍译，中西书局，2013 年，第 14–15 页。

⑫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2，第 802 页。

⑬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2，第 805 页。

⑭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94–106 页；宋海龙：《17—19 世纪中欧枪械比较研究：以两次鸦片战争为重点》，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68–82 页。

枪，双方武器差距比鸦片战争时期更大。[①] 此战让皇帝与前方将帅真实地感受到了中西武器的巨大差距。咸丰帝在军事上恪守成法，漠视火器发展，即位初就曾驳斥黑龙江副都统清安建议军营修制、考查鸟枪的奏请。[②] 但经此一战，咸丰帝的思想发生变化。山西巡抚恒福于 7 月 27 日奏请马匹银两以训练马上排枪，咸丰帝当即允准，[③] 这表明他意识到了发展火器的重要性。

正当英法联军占据大沽炮台时，5 月 28 日，穆拉维约夫迫使奕山等人签订了《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左岸）、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④]6 月 14 日，签署条约的奏折传入京师。此时联军近在咫尺，咸丰帝不愿再与俄国开衅，被迫批准了《瑷珲条约》。[⑤]6 月 13 日，中俄签订《天津条约》，俄国获取了设立领事馆、通商、传教以及重订边界等一系列权利。[⑥] 两个条约的签订使得俄国馈赠一事再度提上议程，其一是表示对清廷领土让步的安抚，沙皇明确表示由于缔结新条约，准赠清廷一批枪炮以“表示其对中国政府之亲善”。[⑦] 其二，在此番危局中，俄国未能给予清廷实质性帮助，导致其在清廷君臣心中的地位大幅下降，[⑧] 普提雅廷希望借此挽回俄国形象。其三，普提雅廷仍打算用这批武器来武装清军以对抗英法。[⑨]6 月 18 日，普提雅廷第二次向清廷提出赠送枪炮与教习，但武器数量有所变动：枪从二万杆或一万五千杆减少到了一万杆，炮则从不到二十尊增长到了五十尊。[⑩]6 月 28 日，钦差大臣桂良奏称俄人请求“帮修炮台，教习枪炮”。[⑪]

此议获得了咸丰帝的高度重视。在桂良上奏的当日，咸丰帝就下旨接受这批武器，但婉拒了俄国派遣教习来华的请求，他更希望俄国能帮助调停，从而消弭中国与英法新订条约当中公使驻京与镇江、牛庄通商等三条款项，“较之派员教演枪炮，修理炮台，尤深嘉悦”。[⑫] 普提雅廷看到回文后，再次向桂良表明派遣教习的必要性：“若兵丁等操演不能合式，亦无利益。若炮位抵津，炮台仍似大沽之徒设，于防守地方亦难得力，鸟枪操练无法，必致废弛，如此安能望其制敌？”[⑬] 从纯军事角度而言，普提雅廷的建议不为无见，僧格林沁在 1859 年缴获了一批英国大炮，但是“仅能得其大概，而不克究其精微”，可见新式的欧洲枪炮确实需要指导方能灵活运用。[⑭] 不过，普提雅廷又趁机提议“修筑炮台、铸造炮位、察看矿苗、熔化金银之鄂托罗官十员，令其迅赴贵国”，[⑮] 这就不乏将中国的矿产与国防都掌握在俄国之手的企图。

在普提雅廷的坚持下，咸丰帝于 7 月 1 日下谕，“准其酌派数人前来，教演枪炮、修筑炮台，并加嘉奖，以坚其和好之心”。[⑯] 至此，咸丰帝第一次同意接受大批西方武器并且允许西人前往中国教习军队、修筑炮台，在晚清对外学习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普提雅廷则对清廷保证：“所派之人，下年可以前来，前允送枪炮，亦于明年送到，用船载至拦江沙外，中国再用沙船自行拨运进内。”[⑰]

---

① 宋海龙：《17—19 世纪中欧枪械比较研究：以两次鸦片战争为重点》，第 145–151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 册，第 166–167 页。

③ 《清文宗实录》卷 257，咸丰八年六月辛酉。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85–86 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5，第 911–915 页。

⑥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86–89 页。

⑦ A. 波波夫：《太平天国时期的沙俄外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36 号，第 38 页。

⑧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99 号，第 54–55 页。

⑨ 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 年 < 北京条约 >》，第 3 页。

⑩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5，第 937 页。

⑪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7，第 985 页。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8 册，第 244 页。

⑬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7，第 998 页。

⑭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5，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082 页。

⑮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7，第 1000 页。

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8 册，第 250 页

⑰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8，第 1011 页。

三、俄国馈赠的中止与下落

虽然清廷表明接受俄国的军事馈赠，但是事情进展一波三折。1859 年 1 月 27 日，咸丰帝授意理藩院给俄使咨文，称“各国船只退出天津海口后，中国已将沿海炮台修理坚固，各国船只未便再到天津海口”，至于俄国枪炮则“应送至库伦，交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等收受，自行运送至京。贵国不必派人前来，以免长途跋涉”。[①] 在这里，咸丰帝在此表明两点意图：其一，枪炮不再海运入津，而是运至库伦后由清廷自行运送；其二，清廷只接受枪炮，再次拒绝了俄国教习。咸丰帝态度改变的背后显然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他仍然渴望获得这批武器，两天后还另谕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在接受武器后给予俄人赏赐。[②]

普提雅廷并未接受清廷意见，仍按原方案推进。在卸任前向俄国外交部递交的述职书中，他提出要尽快解决最重要的边界问题，为此俄国必须为清廷准备武器并派遣五名教官训练中国军队，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沙皇认可。[③] 1859 年 1 月，伊格那提耶夫（Н. П. Игнатьев）被任命为新任大使，执行普提雅廷的方案，具有各种专门军事学识的军官们奉命随其入华训练清军，还押送运往中国的军火大队。[④]3 月 8 日，伊格那提耶夫从圣彼得堡出发，于 4 月初抵达伊尔库茨克并会见穆拉维约夫，[⑤] 押送的武器装于 380 辆大车并由 760 匹马驮运，包括 1 万支火枪，超过 160 万发子弹（含米尼式），外加用来训练清军的军费 50 万卢布。[⑥] 俄国学者将这批武器表述为 10 吨（10000 支）线膛枪、500 枚军用炮弹、100 万个底火、600 吨的米尼子弹及底火壳和比利时新型弹药等。[⑦] 可以肯定，俄国馈赠的这批枪炮是一批数量庞大、性能先进的近代化装备，若其交付清廷，足以使清军火力得到质的提升。然而，这批武器并未及时交付清廷。穆拉维约夫在 1859 年 5 月 2 日给科瓦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中国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武器，这种幼稚的作法真叫人惊讶。”[⑧] 部分外国学者据此认为，武器运输中止的责任在于中方，[⑨] 但是真相绝非如此。

清廷做好了接收武器的准备。1859 年 5 月，德勒克多尔济奏称俄国准备将武器运送入京并更换大使，请求理藩院行文俄国萨纳特衙门予以驳斥。[⑩] 但咸丰帝却在 14 日密谕僧格林沁、恒福选派人员于海口等待俄国枪炮，令俄船停在拦江沙外，“另换内地船只装载运送到津”。[⑪] 此时咸丰帝又做让步，不再坚持陆路方案而是允许俄人将枪炮运至海口。6 月 11 日，咸丰帝在给奕山的上谕中再次允准俄人海运武器：“着奕山等准其由黑龙江、松花江出海，毋庸拦阻。”[⑫] 清廷方面如僧格林沁担忧俄人将武器运至海口将变生不测，[⑬] 但咸丰帝愿冒此风险于海口接受武器，足证他对这批武器的期待。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卷 33，第 1241 页。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四国新档》第 3 册，第 480 页。

③ 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 年 < 北京条约 >》，第 4 页。

④ R.K.I. Queste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p. 174.

⑤ 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 年 < 北京条约 >》，第 5 页。

⑥ R.K.I. Queste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p. 175. Mark Mancall, “Major-General Ignatiev’s Mission to Peking, 1859—1860, ” *Papers on China*, Vol. 10(1956), p.61.

⑦ Н. П. Игнатьев, *Материал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д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Китае Н.П. Игнатьева в 1859-60 годах*.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тип. В.В. Комарова, 1895, С С .19−20. Сосна. Н.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миссии Н.П. Игнатьева в Китай в 1859—1860, ”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 1(2020), С . 33.

⑧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 2 卷，第 261 页。

⑨ R.K.I. Quested,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pp. 178−189; 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 年 < 北京条约 >》，第 11、126 页。

⑩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卷 37，第 1382—1383 页。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第 184 页。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第 259 页。

⑬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卷 37，第 1387 页。

揆诸史实，真正导致枪炮运输中断的是俄方。正当伊格那提耶夫押运武器路经西伯利亚并准备运往中国时，穆拉维约夫对此事明确表示了反对。他在 1859 年 2 月 21 日给戈尔恰科夫的绝密信中提出三点顾虑：其一，他怀疑清廷可能与英国早已达成和解；其二，他担心这批武器会被用来对抗俄国而非英国；其三，他反对俄国教官训练中国军队以及给中国提供大炮，因为这将全面增强中国军力。① 究其根本，穆拉维约夫担心清廷利用这批先进武器来对抗自己，同时对这批武器也有觊觎之心。此时，他统率的远东驻军拥有的各项火炮合计不过 40 门，大炮只有 8 门；② 枪支多为卡宾枪、手枪，数量合计应不超过 1 万支，甚至还装备大量的马刀、长矛。③ 火枪的样式仅为枪膛扩大的滑膛枪，甚至还有不少燧石枪。④ 总体而言，穆拉维约夫手中的装备还停留在欧洲 17、18 世纪的水平，性能远逊于俄国馈赠的这批武器。俄文材料《有关伊格纳提耶夫 1859—1860 年留华期间的材料》对武器的运输中止与下落则明确记述道：

> 在确定了东西伯利亚军队极其糟糕甚至可耻的装备状况后，爱国的伊格那提耶夫一想到向中国转交对俄国来说成本如此之高的改良武器及军火库和兵工厂里的一切配件就愤慨不已。中国人迟早会敌视俄罗斯，而他们会遭到俄国军队的进攻，俄军用的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枪炮和枪炮架，用的是散弹枪和滑膛步枪，甚至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燧发的，只有小部分被翻新成突击式的。伊格那提耶夫对执行普提雅廷伯爵想法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并建议穆拉维约夫伯爵将一些米尼和比利时子弹以及一些在西伯利亚没有的武器留在上乌金斯克，用于建造外贝加尔空缺的武器车间。⑤

可见，伊格那提耶夫和穆拉维约夫深知远东俄军装备落后，唯恐清廷借助这批枪炮对抗俄国，因此擅自拒绝履行普提雅廷对清廷的承诺。其中，轻武器和四名教习留在了穆拉维约夫的军队，大炮被运往诺夫哥罗德港后又转运尼古拉耶夫斯克，50 万卢布留在伊尔库茨克金库。⑥ 穆、伊二人在此事上一贯说谎，前者制造的中国拒绝说已见于前，后者在 1860 年 6 月为讨好额尔金，甚至谎称俄国担忧清军利用这批武器对抗英军，所以中止了武器运输。⑦ 至此，武器中止运输的真相水落石出。

伊格那提耶夫等人擅自扣留武器也与中俄关系变动有关。在英法联军南下后，清廷试图废弃《瑷珲条约》并恢复东北故土。咸丰帝本在万不得已之际批准了《瑷珲条约》，事后屡斥奕山等人办事草率。⑧ 尤为重要的是，虽然《瑷珲条约》规定了中俄新界，但是《天津条约》第 9 条却是两国商定未定边界，普提雅廷与穆拉维约夫各自与清廷签订的条约之间的微妙差异反倒给予了清廷要求重订边界的权限，这让穆拉维约夫极为懊恼，更加剧了他对普提雅廷馈赠方案的反感。⑨1859 年，俄国对中国绥芬、乌苏里一带步步蚕食，势力扩张至吉林三姓地带，咸丰帝决定不再退让，断不允许俄国进占吉林地带，⑩ 严惩了擅自签订《瑷珲条约》的奕山与吉拉明阿。⑪ 主持理藩院的肃顺察觉到东北领土尤其是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重要性，因此强硬地提出要修订《瑷珲条约》，仅允许黑龙江左岸归属俄国，乌苏里江以东仍归清廷所有。⑫

---

①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 2 卷，第 243 页。

②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 2 卷，第 152 页。

③ A. П. 瓦里西也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史纲）第 3 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第 40−41 页。

④ 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 年 < 北京条约 >》，第 6 页。

⑤ Н. П. Игнатьев, *Материал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д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Китае Н.П. Игнатьева в 1859−60 годах.*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тип. В.В. Комарова, 1895, С. 20.

⑥ 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 年 < 北京条约 >》，第 6 页。

⑦ Mark Mancall, "Major-General Ignatiev's Mission to Peking, 1859—1860," *Papers on China*, Vol. 10(1956), pp. 68−69.

⑧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25，第 914 页；卷 30，第 1091 页。

⑨ Mark Mancall , "Major-General Ignatiev's Mission to Peking, 1859—1860, " *Papers on China*, Vol. 10(1956), p. 59.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第 226−227 页，第 258−259 页。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第 71−72 页，第 265、412 页。

⑫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37，第 1399 页；卷 38，第 1411 页；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 年 < 北京条约 >》，第 10−14 页。

1859 年 6 月 25 日，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爆发，此战清军大获全胜，增加了清廷对俄谈判的底气。[1]7 月，伊格那提耶夫入京谈判领土问题，提议帮助中国抵御外国。[2] 不料清廷态度强硬，咸丰帝在 17 日表示“并不借贵国兵力代为御侮”。[3] 肃顺在与伊格那提耶夫谈判中甚至斥《瑷珲条约》为一纸空文，这让后者大失所望。[4] 对于清廷来说，他们等来的不是俄国枪炮而是俄国“日复蔓延，势将无所底止”的扩张。[5] 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上奏主张武力抵抗，得到咸丰帝的许可。[6] 既然清廷不愿承认《瑷珲条约》的领土划分，甚至还准备与俄国兵戎相见，枪炮与教习自然不可能交给清廷而是继续留在穆拉维约夫手中。[7] 伊格那提耶夫则决心等待时机，当英法联军席卷重来并彻底击败清军时，便是俄国攫取更大利益的契机。

四、俄国的第三次提议与陆续落实

1860 年下半年，中外局势再度剧变，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北逃，清廷统治危在旦夕。伊格那提耶夫抓住时机，一方面给英法联军提供了地图、军事情报各种便利；[8] 另一方面则稳住奕䜣等留守谈判大臣，充当清廷与英法联军的调停者，迫使前者接受联军要求。11 月 14 日，中俄签订《北京条约》，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以条约的形式正式并入俄国，[9] 这次“外交胜利”冲淡了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的阴霾，打开了其通往日本、朝鲜以及整个中国沿海的大门。原本中止的馈赠作为安抚清廷的手段重新提上议程。此时清廷兵威屡挫，内乱日炽：太平天国衰而复振，二破江南大营并席卷苏常；捻军纵横江北鲁豫，逼近京畿。[10] 在迭遭重创之后，清廷君臣在中外局势、师夷长技的问题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1860 年 11 月 14 日，伊格那提耶夫照会奕䜣等人称：“中国发捻横行，均由火器不得力。欲派数人来京，教铸枪炮，一并教演。”[11] 这是俄国第三次提出馈赠清廷枪炮武器，用途从对抗英法又转回镇压内乱，而且还提出了代剿逆贼、代运南漕等事。[12] 鉴于俄国前番在此事上出尔反尔，咸丰帝不免疑其诚意，在 18 日的上谕中称：“其馈送枪炮一节，未知是否真诚？以后再当相机办理。”[13] 相较之下，奕䜣、桂良等京师留守大臣态度积极，打算接受武器甚至考虑借师助剿。[14] 对此，咸丰帝于23 日同意接受俄国馈赠，鉴于此时的京津形势，他要求俄国将枪炮运至恰克图，然后“由内地派弁兵运回京师”；至于训练方面，则由清廷从京营中挑选官兵开往恰克图，以跟随俄国教习训练，“轮番更替，以期技艺纯熟”。[15] 咸丰帝此次同时接受了俄国枪炮与教习，足见其对于更新军备的急切。

---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第 387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卷 39，第 1488−1493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第 330 页。

④ A· 布克斯盖夫登男爵：《1860 年 < 北京条约 >》，第 24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9 册，第 332 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卷 40，第 1512—1515 页；卷 42，第 1601 页。

⑦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 2 卷，第 241 页。

⑧ R. J. L. Mghee, *How We Got to Pekin: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of 1860*, Richard Bentley, 1862, pp. 256−257.

⑨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149−153 页。

⑩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香港猛进书屋 ,1962 年，第 1743−1829 页；郭豫明：《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25−229、261−273 页。

⑪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卷 69，第 2601 页。

⑫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卷 69，第 2607 页。

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0 册，第 623 页。

⑭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卷 69，第 2608 页。

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0 册，第 626 页。

1860 年 11 月 23 日，奕䜣奏报俄国同意将枪炮运至库伦并派人训练清军。①1861 年 4 月 4 日，伊格那提耶夫照会道："恰克图地方寒苦，该国教演兵丁及运送匠役，须于四月初十日左右，方可到恰克图……其炮位五十尊，拟于数月间运至天津海口交纳。"② 他在此照会中还提出帮助中国察看金银矿产的要求。对此，咸丰帝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准许大炮海运至天津，但不同意由俄人安设大炮；俄国教习可在恰克图训练清军，不可前往张家口；不允许俄人前来开矿。③ 奕䜣等人奉旨后迅速筹备，从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外火器营中各自挑选 20 名"年力精壮，技艺纯熟"的兵丁与 2 名"心地诚实、自习火器"的章京，共计兵丁 60 人，章京 6 员，还奏请增加薪水、预备奖励，使其安心操演。④ 咸丰帝对这些安排均表同意。⑤ 此外，为接受俄国的馈赠，清廷还在人员安排、接受枪炮等方面做了周密准备。⑥

但是情况又如 1859 年一样，每当清廷积极筹备接受馈赠时，俄国总不能迅速兑现承诺，还企图借此来谋取更多利益，屡向清廷提出进京贸易、开矿等要求。⑦ 这引起了奕䜣等人的高度警惕。⑧ 他们在 1861 年 1 月 11 日上奏评估中外局势，认为发、捻为"心腹之害"，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英国"志在通商"，为"肢体之患"，俄国的威胁显然在英国之上。奕䜣等人在 1861 年 7 月底奏陈其对俄国馈赠的思考：其一，他们强调俄国枪炮为其主动馈赠而非中国索取，"惟该国前既以此示其殷勤，未便拒绝"，实有羁縻之意；其二，俄国担心中国购买英国军火从而倒向英国，仍决定在 1861 年秋末将枪炮送至恰克图，这表明俄国履行承诺是考虑了英国因素；其三，他们认定俄国"其心仍欲开矿，并近京地方设场教演，流弊不可胜言"，这已窥见到了俄国趁机掌握清廷矿产与国防命脉的企图。综合考量，奕䜣等人还是决定派兵"即行起程赴恰克图演习"，但是做好了"所运枪炮果不堪用"的思想准备。⑨

表 1　1862 年俄国武器的分配情况

	洋枪（杆）	铜炮（尊）	炸子火箭（枝）
神机营	4120	3	0
内火器营	0	4	300
外火器营	3004	0	200
圆明园护军营	1000	0	0
健锐营	1000	0	0
天津崇厚练兵处	880	1	0
合计	10 004	8	500

说明：火枪均在枪把底的铜面上刻有标号，每千杆枪编为一字，一万杆枪分别编为"成功资利器，威远著先声"十个字号。崇厚拥有的 880 杆枪均编为"成"字号，编号从一到八八〇。神机营的 120 杆枪接"成"字号从八八一编至一千，剩下 4000 杆枪编为"功资利器"四个字号。圆明园的 1000 杆枪编为"威"字号，健锐营的 1000 杆枪编为"远"字号，外火器营的 3000 杆枪则编为"著先声"三个字号，余下 4 杆枪未编号。

数据来源：陈湛绮编：《清末军械防务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83–119 页。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 · 奕䜣秘档》第 2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300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5，第 2792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1 册，第 67 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 75，第 2799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1 册，第 78–79 页。
⑥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1，第 23–24 页；卷 2，第 43–44 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2，第 45 页；卷 3，第 75–80 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 · 奕䜣秘档》第 2 册，第 331 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 · 奕䜣秘档》第 3 册，第 44–46 页。

俄国枪炮还未到来，咸丰帝便于热河驾崩。1861 年 9 月 23 日，奕䜣等奏报俄国枪炮已抵恰克图，但由于对俄国成见已深，又强调“此次俄国致送枪炮，形迹本近周旋，臣等奏请派人往演，亦以和约新换，未便故却其意”。[①] 12 月 1 日，奕䜣等奏称俄国枪炮运至恰克图，但数量只有枪二千杆、炮六尊，[②] 相较原承诺的枪一万杆少了八千杆，而且大炮“下余四十四尊，改换补送阿尔切塔炮五百件”[③]。俄国教习“每日仅教演步履进退，毫无实益”，乃至库伦办事大臣色克通额奏请撤回京兵。[④] 此时，中俄边境又出现了俄商擅往蒙古各旗贸易，打伤当地人并且接近蒙古活佛等事，甚至俄国还要求在华各处贸易。[⑤] 面对俄国的得步进步，清廷不再指望剩余枪炮。12 月 27 日，清廷表示枪炮“系该国自行愿送，非由中国索取”，其余未到枪炮若是俄国推诿便不必再问。[⑥] 这批枪炮于次年 4 月 13 日抵达京师，交由外火器营查收。[⑦] 考虑到清廷的领土让步以及与英法竞争在华影响力，俄国仍将剩余武器送至恰可图，清廷派人将武器于 6 月 25 日到 27 日转运至库伦并暂存于此，等雨水之后运至京师。[⑧]9 月 16、19 日，库伦办事大臣特克慎派人将这批武器分两起解送京师。[⑨]11 月 24、25 日，外火器营分别收到两起枪炮，[⑩] 共有洋枪八千零四杆、铜炮两尊以及炸子火箭（阿尔切塔炮）五百枝，武器的质量“较之春间所进微觉不及，然比之中国所造已属精利”。[⑪] 清廷接收武器后高度重视，将绝大部分的枪炮分配给京师八旗各营以强化中央军力，并且逐一编号、造册登记，见表 1。

此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练兵，所用武器为俄国枪炮，但教习却是英国人。自英法联军定约撤兵后，清廷与英法的关系大为缓解，后者转而帮助清廷稳定国内统治。[⑫] 事实上早在 1857 年春，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已引起英国的警觉。[⑬]1860 年 5 月 7 日，《德臣西报》称俄国已经凭借英法联军给中国造成的困境攫取了长城以北的亚洲最好地带，由此获得了通往太平洋的海军港口，“当下最迫切的是需要一个联军和中国的紧密同盟以遏制俄国的进一步扩张，由此如有可能则拒绝默许俄国业已侵占的领土”，并且表示当下中国的混乱使得长江航行与沿岸港口开放的新条款完全无效，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重建中国和平。[⑭] 此论对于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富有预见性：究其实质，英国对华战争不以推翻清廷或攫取大片土地为战略目的，[⑮] 而《北京条约》的签订又让清廷的延续成为英国享受新特权的关键。1860 年 10 月 31 日，额尔金在给外相罗素的密信中写道：“如果他们（注：奕䜣等人）继续掌权，那么利益将是巨大的。”[⑯] 咸丰帝去世及辛酉政变的结局让额尔金的愿望变为现实，奕䜣等人构成了清廷新的决策中枢。此外，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后又在远东和中亚成功扩张，这完全出乎英国预料，[⑰] 后者决定扶持清廷镇压内乱并遏制俄国扩张。奕䜣等人也迅速转向，以为与其依靠企图掌控清廷国防的俄国，反不如暂时倚重志在通商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1，第 23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 · 奕䜣秘档》第 3 册，第 115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3，第 79 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3，第 94 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3，第 79 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11 册，第 528 页。

⑦ 陈湛绮编：《清末军械防务档案汇编》第 1 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 年，第 18 页。

⑧ 陈湛绮编：《清末军械防务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35−47 页。

⑨ 陈湛绮编：《清末军械防务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48 页。

⑩ 陈湛绮编：《清末军械防务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57−58 页。

⑪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10，第 461−462 页。

⑫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香港猛进书屋，1958 年，第 891−892 页。

⑬ Perry McDonough Collins, *Siberian Journey: Down the Amur to the Pacific, 1856—1857*, pp. 24−25.

⑭ “The Present Crisis in China”, *Overland China Mail*, 7th May,1860, p. 842.

⑮ Harry Gelber, *Battle for Beijing, 1858—1860: Franco-British Conflict in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72−74.

⑯ W. 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The Clarendon Press, 1937, p. 342.

⑰ A. Lobanov-Rostovsky, *Russia and Asia*, The Geogre Wahr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p. 147.

的英法。在 1861 年前后，清廷已经在购买军备、镇压起义等事上与英法逐步达成共识。① 昔日主持对清作战的英军陆军司令士迪佛立（C. W. Staveley）就在天津训练清兵。②1862 年 2 月 19 日，清廷选派 120 名京兵前往天津接受英国教习训练，后又在 4 月 13 日增派 600 名，“崇厚不时往看，其教练颇为认真”，效果远在俄国教习之上。③

这批俄国枪炮并未像巴拉第所设想的那样“生锈或是将落到欧洲人手里”，④ 而是被用于帮助清廷训练新式军队并且平定国内各地起义。

表 2　俄国武器的后续拨解与用途

	时间	洋枪（杆）	编号	来源	用途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	同治二年	100	“成”字号	天津练兵处	镇压捻军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同治二年	120	“成”字号八八一至一千	神机营	练兵
署陕甘总督都兴阿	同治四年	800	“利”字号一至八〇〇	神机营	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直隶总督刘长佑	同治四年	100	“利”字号八〇一至九百	神机营	增强军备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同治四年	400	“威”字号六〇一至一千	圆明园护军营	练兵

说明：同治二年，僧格林沁调动的 100 杆“成”字号枪支编号分别为七十八至八十七、二〇四至二二八、四四二至四五六、五〇一至五一〇、五四一至五四九、五六三、五八五、五八八、六〇二至六〇七、六〇九、六六〇、六六三至六七二、七八一至七九〇。

数据来源：陈湛绮编：《清末军械防务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157–244 页。

1866 年，神机营派兵携带俄国枪支前往东北镇压土匪，先后从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各自调拨了铜帽 626 096、100 000、190 000 个，合计 916 096 个，占铜帽总数 180 万的 50.894%，各营铜帽为之一空。⑤

纵览同治一朝，这批俄国枪炮在帮助清廷强化京师八旗军队、镇压北方各地起义以及训练新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 2），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此时清廷改弦更张，师夷长技以及强化中央军事力量的努力。不过自同治朝起，俄国又将扩张矛头对准了新疆以及整个中亚，成为清廷长久警戒乃至对抗的对手，英法则成为清廷此后镇压内部起义的同盟以及洋务运动的重点学习对象。

五、结语

俄国送华枪炮与教习一事历时六载。1856 年 2 月沙皇本人提出，其目的为换取黑龙江航行权，枪炮打算用来帮助清廷镇压国内起义。1858 年 5 月 1 日，普提雅廷第一次向清廷提议并增派俄国教习，其用途改为对抗英法，但被咸丰帝断然拒绝。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结束后，普提雅廷第二次提议，用途仍为对抗英法，清廷君臣准备接受，但这批武器与教习却被伊格那提耶夫擅自移交于穆拉维约夫。1860 年底，俄国获得《北京条约》的保障之后发起第三次提议，清廷予以接受。但这次武器运输又分成两次，其间俄国还附加各种条件，俄国的教习态度也颇为敷衍，武器直到 1862 年底才完成交接，最终被清廷用于镇压国内起义。

从俄国对华政策来看，俄国的馈赠始终以清廷领土让步作为第一前提。而且，俄国对清廷

① 1861 年英国对清廷态度的积极转变，参见 J. S. Gregory, *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pings*, Routledge & Kegan, 1969, pp. 87–110. 关于 1861 年英法助清的情况，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第 936–992 页。

②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上海书店，1986 年，第 881 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 3，第 110–111 页；卷 4，第 150–151 页；卷 5，第 183–185 页。

④《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 99 号，第 55 页。

⑤ 陈湛绮编：《清末军械防务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256–276 页。

的外交政策可谓得寸进尺。即便是在 1860 年《北京条约》已经确保了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归属俄国的情况下，俄国仍要在这批武器上附带诸如开矿、通商等各种条件，使其变成了一个不断向清廷索取利益的诱饵，可谓“危险的馈赠”。

就清廷因应而言，此事又可作为透视清廷对外学习态度的一个窗口。直到第一次大沽口战败前，咸丰帝对革新军事的态度是相当消极的。但是此次战役后，他意识到了西方武器的优越性，因此做出了接受俄国武器的决定，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学习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某种程度上讲，咸丰帝对俄国馈赠的接受表明了清廷最高统治者师夷长技的尝试，体现了咸同之际清廷对外政策的微妙变化。清廷接收到俄国枪炮后对其高度重视，在强化京师八旗军备、镇压北方各地内乱、训练新式军队等方面都处处显示出俄国枪炮的身影。

最后从列强博弈与中外格局的角度出发，这批武器是俄国用来与英法竞争对华影响力并强化其在华地位的工具。不过，俄国在此事上的反复无常及对中国的扩张无度引起了清廷的警觉，反而将后者推向了原本与其交战的英法。究其本质，英法对华战略侧重于经济扩张，俄国则侧重于土地扩张，后者在清廷心中危害更大，这就影响到咸同之际清廷对外学习的选择与外交方针的制定。此时，清廷在借师助剿、练兵、购买枪炮轮船等洋务上逐步转向英法等国，对俄国则充满了猜忌与防备。俄国并未实现原本掌控清廷国防的目的，也未取代英国在东方事务上的领导地位，反倒成了清廷高度戒备的边疆对手。

References

Airapetov, Oleg. *Kuibai zhi lu: 1904—1905 nian eri zhanzheng* (Road to defeat: Russo-Japanese war in 1904—1905).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21.

Alexandrovich, Sosna Nikolai. “Prepare the mission of N. P. Ignatiev to China in 1859—1860.” *Human Capital*, 1(2020).

Dangerous Gifts: Russia Firearms and Trainers Sent to China during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s (1856-1862)

DING Guozo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ngguozong@163.com)

Abstract: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Far East, Russia decided to provide firearms to the Qing court in February 1856. On May 1, 1858, For the first time, E.V. Putyatin, the Russian ambassador to China, formally proposed a gift of firearms and trainers to assist the Qing court’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British and French allied forces, but the Qing emperor Xianfeng turn it down. After the first Battle of Taku Forts, Putyatin proposed it again and Emperor Xianfeng accepted, but the by the new ambassador, N. P. Ignatyev only transferred the firearms midway to the governor of East Siberia, N. N. Muravyov, rather delivering them to the Qing Court. At the end of 1860, Russia proposed the plan a third time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Beijing Treaty to secure its interests, and the Qing Court accepted it again. The firearms were sent to the Qing Court in two separate stages, and Russians trained the Qing army in Kyakhta. However, Russia failed to mollify the Qing Court, and instead aroused the court’s wariness because of its own expansion and additional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ers and training. Finally, the Qing court turned to Britain and France as a model for military reforms.

Keywords: Russian firearms, second opium war, Emperor Xianfeng, Putyatin, sino-foreign situation